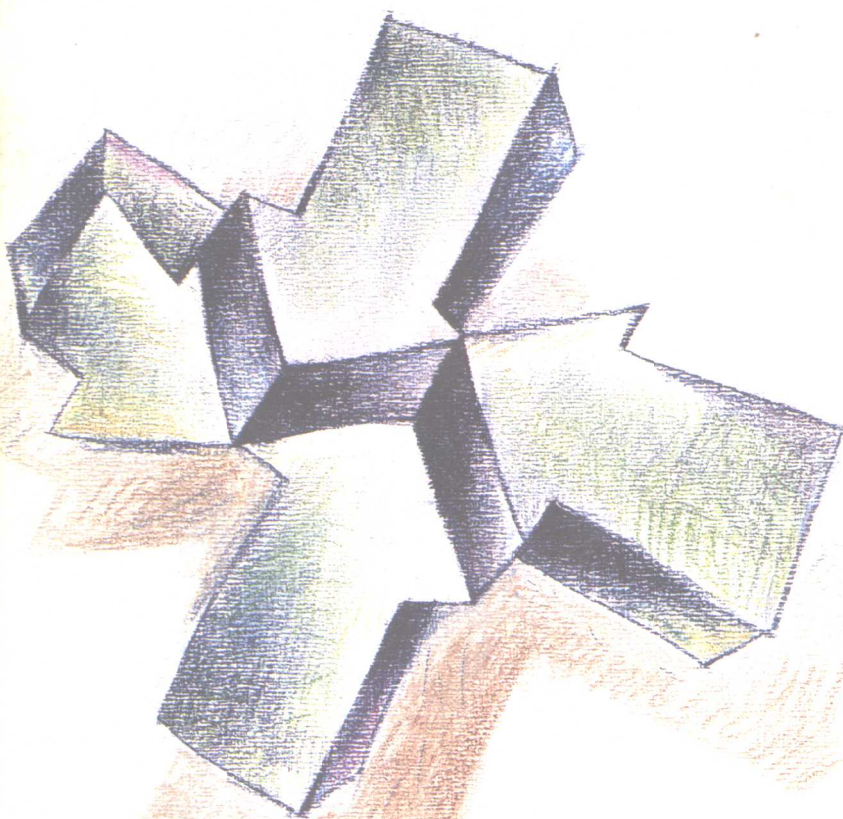


五四： 多元的反思

顧昕 蕭功秦 許紀霖 嚴搏非 陳來 劉小楓 陳萬雄 龐樸 甘陽 劉再復 朱維錚 劉述先 李澤厚 林毓生 王元化



林毓生等著

五四：多元的反思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林道羣
封面設計 洪清淇

書名 五四：多元的反思
作者 林毓生等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次 香港柴灣利業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規格 一九八九年四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大三十：開（140×203mm）：七：面

ISBN 962-04-0720-2

© 1989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編者小引

本書名爲《五四：多元的反思》，既概括了內容，也蘊涵着希望。

七十年前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早就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作出反思和詮釋。可惜這樣的探索，在中國曾經中斷了幾十年。逢五逢十的紀念日子，固然也有大量的文章論述發表，但多數用引經據典作爲立論模式，用趨時隨波代替學術研討。近十年來情形有所改變，但比起七十年前中國思想界那種活潑自由的局面，似乎仍然遜色。

編入本書的十四篇論文和對話，反思的深度和詮釋的新意，未必盡如人意，却凸顯出關於「五四」的多元反思的進展程度。由「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始終吸引海內外學者和讀者們的注目，我們希望，本書能對讀者朋友們更深刻地反思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提供一點助益。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錄

編者小引

爲「五四」精神一辯……………	王元化	一
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		
——簡答王元化先生……………	林毓生	二八
「五四」的回顧與前瞻……………	劉述先	四六
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		
——爲「五四」七十周年而作……………	甘陽	六二
失落了的「文藝復興」……………	朱維鈞	八二
「五四」文學啓蒙精神的失落與回歸……………	劉再復	九二
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龐樸	一三三
關於「五四」一代與「四五」一代的社會學思考札記……………	劉小楓	一三九

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

——「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陳來 一五一

這一代人——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分析……………陳萬雄 一八六

論「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理解……………嚴搏非 一九八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試論陳獨秀的平民主義民主觀……………顧昕 二一五

「五四」：多元的反思

——林毓生與許紀霖、蕭功秦對話錄……………記錄：秦晴 二四一

「五四」與中國文化討論的迷思

——訪問李澤厚先生……………訪問：林道群 記錄：李志華 二五二

爲「五四」精神一辯

王元化

問：明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北京和上海理論界都開過討論會。聽說你在幾次會上都作過發言。請你談談自己的看法。

答：「五四」包括了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指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發生的學生運動，另一個方面則是指在一九一六年開始發生的思想運動。一般把前者稱爲「五四」救亡運動，把後者稱爲「五四」新文化運動。兩者有着密切的關聯，都具有要求民主要求科學的反帝反封建性質。過去我們對此並沒有嚴加區分，而是總起來把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作爲「五四」精神的代表。可是，後來逐漸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救亡運動分開來。有人認爲「不宜視爲一個運動的同體兩面」（呂實強）。也有人認爲「處『五四』浪漫革命之時代，學術很難不受外界之干擾，學者亦鮮有不走向十字街頭的」（汪榮祖）。胡適於一九六二年逝世前所作的《口述自傳》中，用整整第九章《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對這種看法作了更爲明確的論述。他說：他那時出於一番患忱，想把「五四」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可是終於被「五四」的政治救亡所阻撓而中斷了。他認爲當時青年由於受到多個政黨的爭

取拉攏，都對政治發生了興趣，因此使他一直作「超政治構思」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也就被大大削減了。我們應該公正地看待胡適。他確實是從他的信念出發。我們不能把他認為青年投身救亡運動是受到政黨爭取拉攏這番議論和當時日本持對華侵略態度的政府、軍部或輿論說「五四」排日運動是受英美兩國的煽動和野心政客林長民、熊希齡、汪大燮等唆使的結果等同看待。①無疑地，胡適認為參加「五四」救亡運動的青年都是盲目無知受人利用，這是極大的偏見。但這種偏見是和自身不僅不反對政治而且還積極參政的胡適對於羣衆運動的極端厭惡以及他總想保持和平沖淡的保守寧靜心態是一致的。科學地研究胡適思想以糾正五十年代初那場從某種政治目的出發而毫無任何學術價值的胡適批判運動，將是一項重要的課題。不對胡適功過作出正確的評價就無法認識中國的現代思想文化史。不過我不能在這裏來探討這些問題。

我想要說的是，最近國內也出現一種類似說法，認為「五四」啓蒙運動的中斷是由於救亡運動。於是有人據此提出了爲學術而學術的觀點（在書齋中透徹分析研究），以爲這才能使學術健康發展。誠然，過去在極左思潮下，政治干擾學術，強迫學術爲政治（甚至爲某一時期的政策）服務，把學術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確實扼殺了學術的生機。這種情況不應重複。至今它的根株未盡，仍舊在不斷冒頭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必須反對學者與藝術家的參與意識，以爲有了參與意識就會喪失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有人以爲西方的啓蒙運動不像「五四」那樣受到救亡的衝擊，所以才可以貫徹到底。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五四」啓蒙文化本身正是從救亡圖存的要求中誕生的。「五四」前夕，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接着巴

黎和會、張勳復辟。一系列的喪權辱國的嚴重政治事件激發了大批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國家危急之秋，爲了救亡圖存，感到必須喚醒民衆，「掃除蒙昧，啓發民智。」後面這八個字就是我們今天用的啓蒙一詞的由來。把啓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對的。西方固然沒有發生過「五四」那種救亡運動，但是在西方啓蒙運動中，思想革命和宗教革命、政治革命是緊密相關的。爲什麼這一情況沒有造成西方啓蒙運動的中斷？早在文藝復興時代，那些在學術上作出卓越貢獻多才多藝的思想家，都關懷當時的實際生活，用筆和劍去進行鬥爭。這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學術，相反，成爲激發他們創造力的一種活力，使他們突破了因襲成見和階級局限。後來的啓蒙思想家和中世紀那些繁瑣經院哲學家在四壁蕭條的斗室中進行苦思冥想的治學方式截然異趣，他們也像文藝復興思想家那樣關懷生活、參與生活，從生活中獲取力量。在這一點上，和我們「五四」啓蒙運動並沒有什麼兩樣，在抗戰爆發前夕，也正是面臨國家存亡關頭，一些進步理論工作者又提出新啓蒙口號。當時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有些人還寫過專著，何幹之就出過一本《中國啓蒙運動史》。我自己在一九三八年還發表過《抗戰文學的新啓蒙意義》一文。^②可是後來得到通知不要再新啓蒙的提法，這次出現不久的新啓蒙運動也就夭折了。至今我還不明白是什麼原因，我想查閱黨史資料也許可以找到答案。不管怎樣，在抗日戰爭前後，理論界曾再一次揭舉了啓蒙的旗幟，這是事實。

問：既然你不贊成救亡壓啓蒙的說法，那麼「五四」啓蒙運動的中斷是由於什麼原因呢？
答：在於當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幼稚和理論上的不成熟。他們錯誤地把啓蒙運動所提出

的個性解放、人的覺醒，自我意識，人性、人道主義等都斥爲和馬克思主義勢如水火、絕不相容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類似的看法恐怕至今並未絕迹。長期以來，我們對馬恩著作中關於個人的自由發展、自我意識、人性、人道主義等等的論述，一概採取了回避態度。③直到這幾年解放思想，衝破禁區，才開始援引有關這方面論述的馬恩原文。例如，《共產黨宣言》對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人類自由發展的前提的論述，《資本論》第一卷對「人的一般本性」和「在不同歷史時期變化了的人性」以及第三卷和《神聖家族》對人性的論述。這些馬克思主義觀點，和長期以來我們流傳的以階級的人性來否定人的一般本性的觀點是截然相反的。至於馬恩把自我意識作爲一種叛逆精神，提出它的反封建意義，我們從他們著作中可以多次讀到。他們認爲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可是，諸如此類的論述，竟然成了禁區，沒有誰敢於在自己文章中加以援引，而這一切是發生在超穩定性的封建主義力量仍然強大，我們的反封建任務並未完成的情況下。十年前，個性解放、獨立意識、人格尊嚴、人格力量、人性、人道主義等，都成爲政治運動的批判對象。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就思想上來說，除了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幼稚和在理論上不成熟外，也由於我們受到一種傳統偏見的束縛。我願再引述一段去年初拙文中說過的話：中國傳統觀念側重於共性對個性的規範和制約，而忽視個性，以社會道德來排斥自我，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倫理道德規範，從而使個性失去了它的主體性。但是，真正活的創造力是存在於組成羣體的個體之中。沒有個體的主體性就沒有創造力，正如沒有個人的自由發展就沒有人類

的自由發展一樣。用羣體來抹煞構成羣體的個體，那只是抽象的羣體，這種抽象的羣體和抽象的理念沒有什麼兩樣。否定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需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不僅是和否定人性聯在一起，也和否定個人，否定自我聯在一起的。實際上，壓抑個性，扼殺個性的結果，就會使健康的合理的個人意識被邪惡的個人貪婪所取代。因為個人的自我是不能被消滅的。在「文革」中「鬥私批修」，「狠抓私字一閃念」鬧得最兇的時候，也正是社會公德被踐踏和社會道德最敗壞的時候。不能想像羣體中的絕大多數個體都是無價值的，而由他們構成的羣體竟會是有價值的。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沒有個性對共性的突破，就沒有發展和進化。④

當時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受到蘇聯庸俗社會學的機械論和日本福本主義極左思潮的很大影響。傳統文化的固有偏見，再加上傳人的似是而非的錯誤理論的影響，雙管齊下。這種情況形成了當時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的幼稚，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不會使人感到奇怪的。我認為這就是「五四」啓蒙運動中斷的重要原因。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提出這一點呢？沒有必要把責任推諉到救亡上去。所謂救亡壓啓蒙，這是事實，不能成為規律，因為沒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一方面將「五四」啓蒙運動的中斷歸咎於救亡，一方面對於為學術而學術的觀點採取了一種吞吞吐吐、曖昧不明的態度，一方面又不願置身於時代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之外，這就形成了理論上的混亂。我們不是完人，不能沒有錯誤。理論工作者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和發生在別人身上的錯誤，要有一視同仁的不容情的態度，而不能文過飾非，採取彌縫補漏的辦法。

問：你對海外學者關於「五四」的評價有什麼看法？

答：長期以來，我們對於「五四」採取了一種漠然態度，理論界也很少加以研究。海外的情況却不同，對「五四」的研究始終沒有中斷，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使人讀後深受啓發。不過，我對於有些海外學者否定「五四」的偏激態度是不能苟同的。我認為，對於近七十年前發生的、曾對中國歷史起過並還起着巨大影響的這場運動，今天已經到了可以公正地加以再認識和再評價的時候了。在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需要的。可是，海外學者中有人把「五四」運動跟義和團運動相提並論，說成是偏頗的兩極（杜維明）。還有人進一步說，「五四」是「文化大革命」的先河。日本東洋史學家宮崎市定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運動和「五四」反日運動是一脈相承的。另一位美國學者在美國政治學會出版的《美國政治科學學報》上爲本傑明·史華茲教授的《五四運動的回應》寫的書評中也說「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最溫和的胡適在內都是「感情用事」的，而這種「感情用事」的行爲和作風在「文革」時勃然再起，這對那些「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讀書人的老遺傳，而又受有時代教育的新知識分子，真是一拍即合」（唐德剛）。這些說法與其說是出於理性的考慮，不如說更多地出於偏見與好惡。其實把「五四」精神和義和團精神以至造反精神一鍋煮，是一種不分皂白的牽強說法。爲什麼把「五四」作爲「文革」的先河，而不把義和團視爲紅衛兵的前驅呢？後兩者倒是有共同的根源，都基於同一的農業文明，或像張光直教授所說，一種連續性的、發源於薩滿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傳統。在天安門受檢閱的紅衛兵，那種完全喪失理智的狂迷、號叫、哭泣，有如巫神附體，準備爲了愚昧的崇拜赴湯蹈火，獻出自己。這和義和團以同樣的狂熱和愚昧，憑着刀槍不

入的符咒，冒着敵人的炮火，毫無畏懼，前仆後繼，有什麼兩樣？試問呼喚人的覺醒、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精神和民主與科學的「五四」啓蒙思潮是不是也是這樣呢？這種不倫不類的類比，這種由於嫌惡而產生的偏見，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辨證。流風所披，這些年來，隨着新儒學和儒學第三次復興的傳播，國內也出現了和海外某些學者評價「五四」的類似論調。我覺得對「五四」的這種嫌惡是由「五四」的反儒精神所激起的，從新儒學和儒學第三次復興的崇儒立場出發，自然會引伸出「五四」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和主張全盤西化的論斷。

問：是的。經過認同，認為「五四」主張全盤西化和全盤性反傳統已不是某幾個海外學者的觀點了。在國內似乎也逐漸風行起來。聽說你在最近幾次理論討論會上都對這種觀點表示了不同看法，你是不是可以進一步談談你的意見？

答：是的，我正在搜集材料，準備寫一篇文章談談自己的看法，也許和很多同志的看法不同，但我不想掩飾自己的觀點。目前我正在準備中。你是喜歡用「超前」這兩個字的，現在要我還未準備好也超前，我有些為難。但既然開了頭，那就談下去吧。

從表面看，「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兩者似乎一脈相通。我最近讀到海外學者的一篇文章，以對儒家的態度來衡量國內學者，認為在今天誰推崇儒家或至少對於儒家的尊重多於批評，誰就是糾正「文革」批孔的錯誤，誰就是開明改革派。這種看法大概是出於對國內情況有些隔膜，所以作了這樣的判斷。他們不理解在過去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思想批判只是達到政治目的的實用手段，只要略為了解諸如海瑞、《水滸》等等這些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

在劇烈政治鬥爭中的浮沉榮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號召作家去寫的清官楷模，但由於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爲「文革」序幕祭旗的犧牲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真的批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嗎？不是。《水滸》這部小說曾被宣佈包含了不少辯證法，新編京劇《三打祝家莊》也一再受到熱烈的獎勵，但是在「文革」中一下子變成了宣揚投降主義的反動著作。當時是真的批宋江嗎？不是。它們都作爲影射的符號，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些選來祭旗的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只是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孔也是一樣，就在當時恐怕連不大識字的人也都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誰。這也就是當時除了御用寫作班子的少數筆桿子外，理論工作者（那怕是一貫對儒家採取批判的人）都對這場鬧劇採取了堅決抵制態度的緣故。如果不懂歷次政治運動總要通過文藝批判來揭開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獄以來就已存在的所謂「影射」這兩個字的妙用，那麼只能說還不大了解國情。需知，「文革」期間，固然是把封資修一古腦兒作爲批判的對象，可是，經歷這場浩劫的過來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裏陽秋。儘管表面聲言封資修是一路貨色，而實際上今天誰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義復辟。試問：當時被尊崇並凌駕在馬克思主義之上的法家不是封建主義是什麼？作爲封建主義思想支柱的三綱五常，對儒法兩家來說是相通的，甚至是互補的。倘使知道文革期間連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都當作外國的孔夫子去批，難道還能認真地——或者直白地說，迂腐地去把這場批判當作是眞在反儒嗎？身居海外，昧於實情，被徹底批判和徹底決裂的叫喊所迷，以致作出錯誤判斷，這是不能苛求的。記得一·二八淞滬戰爭停戰後，上海居民爲了驅走天狗吃

月亮點放鞭炮，日軍以爲是槍聲連忙出動，鬧了一場誤會，也是由於同樣的隔膜而認真起來的緣故。

一位海外學者在文章中說，毛澤東繼承了「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主義（林毓生）。關於毛澤東的文化思想，現在已開始了較爲實事求是的研究，使許多問題都逐漸明朗起來。分析他在文化上的一些觀點，是項複雜的工作。如果僅僅根據他說的一些話，從表面上去判斷，就難以弄清真象。他是政治領袖，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策略家。據傳一位作過他多年助手的同志說過，他的話是很難理解的。這句話在「文革」時被揭發出來，使這位同志受到批判。解放不久，陳毅同志一次在上海作報告時說，毛澤東熟讀春秋戰國史。他對清史也很熟悉。他曾稱讚康熙，號召作家去寫康熙。這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早在五十年代，我聽夏衍先生告訴我，他去中南海見他，他曾問夏對乾隆怎樣看法。後來「文革」評法批儒時，乾隆被列入法家，備受讚揚，這似乎並不是偶然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他近著《觀察中國》中說，美國人對這一點完全茫然無知，我認爲，這並不是苛評。早在四十年代，毛澤東就以「形式主義」的說法指出「五四」評價問題全好全壞方式的片面性。這恰恰與上面那位海外學者說的把傳統文化當作統一整體加以全盤否定的「五四」人物的思想模式是大相徑庭的。雖然毛澤東對於傳統也說過一些片面、過激的話，但是對他多作一些了解，就可以看出他並不否定孔子。他稱他爲孔夫子。從他讚美魯迅爲新中國的聖人這一稱號，似乎也從中透露一些消息。一再被人援引的經典性的說法，所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總結，這是他的名言。從他的思想，從他文章中的徵引，可

以看出他和包括孔學在內的舊學的淵源關係，據傳他晚年讀的是大量錢裝書。其實更早時候，四十年代初，他在那篇作為歷次思想改造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就表示了對於傳統文化的重視。他批評當時學者「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但事實上，就是在近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這裏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希臘呢？這種激憤同樣表示對於傳統文化的一種偏愛。我認為說他繼承了「五四」徹底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思想才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恐怕是太不了解他了。⑤

問：我剛才提出的問題比較複雜，涉及的方面太多。現在你是不是可以回答，「五四」究竟是不是全盤否定傳統與主張全盤西化？

答：這確實不是三言兩語可說盡的，我還不能直截了當回答你提的這一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還涉及到怎樣理解批判繼承傳統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才能把你提的問題說清楚。長期以來，批判繼承的最簡煉的說法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個說法經過不斷簡化和濫用，已變成一種機械理論。照這種理論看來，知識結構只是各種不同成分的混合與拼湊，而不是存着內在聯繫的整體，各部分之間沒有相互滲透和相互作用，沒有完整的系統或體系，因而可以進行任意分割和任意取捨。但是，就知識結構的整體、系統或思想體系來說，却不容這樣割裂。⑥正是由於上述機械觀點長期成為批判繼承文化傳統的準則，於是對古代某一思想家進行評價時，往往出現不同觀點的評論者從中各取所需，作片面的摘引，以證己說。這種摘句法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結論和截然不同的評價，形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奇異混淆。我們很少去把握

古代思想家的思想體系，從各部分到整體，再從整體到各部分，進行見樹又見林、或見林又見樹的科學剖析。六十年代初，理論界曾探討了莊子哲學的思想體系。我覺得，不論這種探討是否作出成績，總比摘句法的引證要好。自然在探討莊子哲學思想體系的時候，也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用有待——無己——無待的三段式硬去印證《莊子》各篇以至篇中的每句話，而忽視原則和原則運用之間，思想體系和具體觀點之間的可能差距。從部分到整體，再從整體到部分，都不能不作細緻的剖析而採用簡單印證的辦法硬套。

就思想體系來說，我認為後一代對前一代的關係是一種否定的關係。但否定就是揚棄，而並不意味着後一代將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徹底消滅，從而把全部思想史作為一系列錯誤的陳列所。前一代思想體系中積極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後一代思想體系中，成為新的質料生成在後一代思想體系中。這是辯證法的常識，也是思想史的事實。但是，要真正吸取傳統文化中的積極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們消融成為新體系中的質料，就得經過否定。正如淘金，就像劉禹錫詩中說的：「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批判得愈深，才愈能區別精華與糟粕，才愈能使傳統中的合理的積極的因素獲得新的生命。我以為對於「五四」的反傳統精神也應從這種角度去理解。一聽到否定傳統文化就馬上緊張起來，以為又在鬧義和團，或重演紅衛兵故技。這種緊張實際上是基於一種保守的心態。

需知，對舊傳統不能突破就不能誕生新文化。每一種新文化的誕生，都是對舊文化的否定。至今我仍覺得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話是對的：「每一個新的前進步驟，都必然是加於某一種神聖